

“写的是些什么？”黄看了看，直摇头：“我看不懂，保安科长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拿给他看一看吧。”我拿给当时的保安科长吴奎昌，对他说：“你看写的是些什么？”他略微一看说：“这是谁写的，写出这样诗的人，可是个有学问的人呀！”他接着对诗意作了解释，大意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立志抛了家，现在落到敌人的手里，今后怎么战斗下去才好呢。看起来是抒发自己的感情的。我看她写的字非常锋利。我当时曾把它保存起来，后来遗失了。

大约是把赵一曼解到哈尔滨后的两周，我被调到长春检察官事务所受训去了。离哈尔滨的时候，我到病房去了一趟，我记得那时候她还不能坐起来呢。两个月受训終了，我转调到阿城县，去阿城之前，我看见赵一曼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了。

我到阿城不久，从报上看到：“赵一曼在监视的警士和看护妇的援助下，从医院里逃跑了，在逃跑途中又被哈尔滨警察厅逮住。”

后来，特务科里的人，又把赵一曼从警察厅引渡到省公署警务厅，关在地下室里。

以后我见到大黑，他对我说：“你让一个了不得的人活下去，结果呢，她同警士和看护妇结成一伙，逃跑了。”我说：“我到阿城去的时候，也想到，她的腿好了，必须改变监视的方式。怎能这样说我呢？对一个能组织起三万多群众的人，就应该考虑到她会吧警士和看护妇拉过去，失败的原因是把同一个警士和看护妇留在她身边的时间太久，而没有调换。”大黑说：“好的是把她逮住了，若是让她逃回原来的地方，不知道将有多少日本人被杀掉呢。我们是受了一次骗，凡是叫共产党的人，我认为杀了是没有错的。”从这些话里，也可以看出赵一曼这个人的侧影了。

此后几个月，我因病回日本休假。从日本返阿城任所时，路过哈尔滨，住在大黑的家里，问起赵一曼，大黑的一个同乡森口作沼（当时正在大黑部下当警副）对我说：

“赵一曼和周百学被引渡给宪兵队杀掉了。为了让大野先生知道杀她们的情况，我要股长让我到现场去。这两个人是带着手铐脚镣，由四五名宪兵押解来的。他们坐载重汽车到枪杀中国人的郊外，从汽车上下来就让她俩坐下。上级宪兵（大概是个准尉，我记不太清了）对她们说：‘还有什么说的吗？’周百学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带着脚镣子走起路来不方便，给我把脚镣取下来’。宪兵苦笑着把脚镣取了下来。接着又问赵一曼：‘你有什么话讲吗？’赵一曼说：‘没有什么说的了，不过我家乡还留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如果能把我的话传给她，就这样传吧：‘母亲为了抗日运动，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给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地

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这时候宪兵里的指挥者对已经举枪待放的四名宪兵下令：‘开！’枪声响了，两个中国共产党人倒下了，她们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一九六二年五月)

革命先烈郑佑之的事迹概况

郑瑞符

革命先烈郑佑之出生在宜宾县古罗公社同力大队化象咀，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从事革命工作，成为早期的革命党人之一。

佑之出生于1891年，他五岁启蒙在家乡私塾读古书，由于他的天资聪颖，勤奋攻读，在十三岁以前通读了古代文学，文章写得很好，名著乡里。清朝末年，变法维新，新学兴起，他在十四岁时离开家乡，到自贡去读高级小学，十六岁转入宜宾县立高级小学，十八岁升入叙属联立中学。旋即辛亥革命发生，他就在宜宾北路一带乡镇，奔走呼号，鼓舞群众，组织同志会，参加当时的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后来，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去成都在四川高等农业学校殖边科读书，学会了蒙藏语言文字，立志为开发祖国边疆的农业生产而奋斗。但当时因受家庭经济的困厄，未能毕业就停学回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他的出身是个地主家庭，生身母亲早死，无人照顾，从小就受经济的困厄，在学校读书需要的笔墨纸张都没有钱买，到成都读书的学费还是他自己找亲友资助的，中途被迫停学，这是他生活中最初从封建的地主家庭受到的一个深刻的刺激，他开始愤恨这种地主家庭的生活。停学回家后，从1915年开始他就在家乡自修，博览经史子集一切古代文学，又订阅了许多书报杂志，留心时事政治，研究新文学。在这个时间内，地方军阀割据，土匪蜂起，城乡隔绝，农村十室九空，逃难他方，佑之也到荣县五宝镇避难了一段时间。当时他看见军匪团阀肆虐，人民不得聊生，他就挺身而出，几次与恶霸势力作斗争。有一次，他查实了本乡团正李少白贪污的账目，给以严重的打击，但由于李少白投靠了县里团阀雷士奇（县团练局局长），不但没有认罪改过，反而变本加厉地危害人民，对佑之更多方进行迫害，如捣毁了佑之创办的革命学校，并欲逮捕佑之，由此佑之对旧社会反动统治愈加深恶痛绝。

1919年俄国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播到了中国，佑之从阅读革命书籍中，接受了革命的理论，革命思想在他脑子里扎根萌芽了。1920年，佑之在宜宾北路柳

柳嘉创办了一所高初的完小学，是由这个乡所属的八个场共筹经费来办的，他被选为校长。学校还没办上一年，该场上豪刘汝成把持团政，恶霸蔡京华把持教育，他们互相勾结，排斥佑之，一方面侵蚀学校经费，另一方面捏辞侵占校址，竟在逼走佑之，由他们另办。殊不知佑之凛然不惧豪霸，召集八场人士开会商讨，主张学校经费独立，不由乡政统管，并另行筹款建修学校，给了反动统治集团的严重回击。这些恶霸是不会就此甘休的，他们后来策划阴谋，伪装好意，介绍他们团防中的师爷彭铁侠入校来当教员。彭是一个恶棍，善于打条开方，做状纸，打官司，从中取利，入校后不负责任，经常缺课，每周到课不到一半，同事都不满意，佑之秉公处理，照缺课钟点扣薪，他恼羞成怒，暗中进行捣乱和破坏，煽动学潮，诬告佑之。佑之毫不动摇，坚持斗争，最后由县教育局派员来校调查，查明情况，揭穿了他们的阴谋，撤销了彭铁侠的教员职务，维护了学校的经费，使这个学校的教学事业得到巩固和发展。历经曲折和艰辛，佑之曾在黄狮桥的石碑上题讽刺诗“平平坦坦无阶级，迂迂腐腐莫题桥”。

佑之在柳嘉办学期间，经合什宣化小学教员张兴钰介绍，与川南师范学校校长恽代英通信，他们经常书信往来，谈及祖国社会的腐败，人民的痛苦，挽救的办法只有用马列主义作革命指南的南针，才能成功，彼此情投意洽，1922年暑期，佑之到县开会后，乘船赴泸州，而见恽代英，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佑之就在党的领导下，经常与在成都等地的何珽辉、张兴钰、刘单如等书信联系，进行革命工作。

1923年，在地方恶霸势力的集中倾轧下，佑之离开柳嘉，到合什宣化小学教书。1924年，佑之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回古罗来，创办普岗寺平民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启发农村革命思想，组织农民运动，培养革命力量。当时，党组织介绍了泸州市自强学校的教员李德愚，资中小学的教员刘谋成和龚言修等先后来普岗寺平民学校帮助教学。现在红旗小学的教师石兆祥、水塘生产队的陆少怀和化象生产队的陆少华等都是在平民学校受过佑之教导的。佑之还从学生中选送了石兆祥、龚缉熙等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他们在那里很幸福地受到过毛主席的亲自教育。

由于佑之在普岗寺平民学校，宣传革命真理，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面貌，直接打击了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利益，宜宾县团阀雷士奇在1925年指挥他的走狗、古罗乡正李少白，将学校捣毁，事后，佑之回到学校，见到遭到破坏的校舍，便在残存的黑板上题诗八句：“去年到此来，学生九十九。今年到此来，讲台睡斑狗。谁是我敌

人，大家莫袖手。谁是提倡人，含泪出门走。”同年，佑之又受聘去县教育局任视学。他在担任视学当中，经常到各路去查学，身背包袱，手拿纸伞，脚登草鞋，不辞晴雨，也不事先通知，只身进入学校察访，教师有不认识他的，还只说是来校卖文具的商人，问他从何而来，有什么出售，佑之风趣地回答：我从县里来，并没有什么出售，这里有一张表，要买老师们的成绩，请把你们的价目填在表上，我切实审查后，带回县去上报。此时，老师惊惶起来：怎么不先通知，我们不曾准备。烈士说：先有准备，是表面敷衍的，要在平时，才见你们的真像，希望老师们经常认真负责好了。佑之平易近人，治学严谨的作风，与那些耍弄权势，讲究排场的官吏，形成鲜明对照，在教师中传为美谈。通过对学校视察，他还了解到各地团防贪污敲榨，与雷士奇上下勾结，危害人民的种种事实，回县后马上揭露了，雷士奇视佑之为眼中钉，捏造罪名，将他逮捕关监，后经教育界人士营救才得出狱。

1926年，佑之在国共合作的县党部，创办了中山中学，积极组织领导宜宾学生运动，开展街头宣传，举行游行示威，散发革命传单，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的口号。当时，军阀张志方旅长驻防荣县，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大肆压榨人民，还派兵到五宝镇，把群众关锁起来，逼收捐款，佑之派地下党人到荣县五宝镇来，组织陈家裕等，开展抗捐运动，并发出快邮代电，各地纷纷响应；佑之在普岗寺学校召开大会，组织川南农民自卫军，与张志方军阀相抗于野客山前。他又派李坤杰率领宜宾妇女群众，经过五宝，直抵伪军的驻营地点李家堰，宣传军阀罪恶。声势浩大的抗捐运动，震动全川，迫使反动当局撤销县长邓邦植，将张志方旅调走。

大恶霸，川南清乡总司令刘文彩和宜宾城防司令覃筱楼等人对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在1927年春，他们配合重庆“三·三一”惨案，捣毁国共合作的县党部和中山中学，不久又逮捕和杀害了宜宾党组织的负责人李筱文和李家勋。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宜宾。佑之担任县委书记，转移到宜宾北路大塔、古罗、柳嘉、荣县五宝、牛尾一带，开展农运工作，组织大塔农民暴动，枪杀了为恶多端的大塔团总眭少林，为民除一大害。后来，佑之又担任过川南特委书记，领导过自贡井厂工人运动和荣县富顺炭厂工人运动，组织过荣威农民暴动。

嗣后，佑之从川南转调川东，担任合川县委书记，他领导了有名的“马房斗争”和“反饥饿斗争”，组织马房街一带贫苦群众，抗议驻军陈书农师强行拆除民房，拒不迁移，取得了胜利，又在年关组织饥寒交迫的贫民列队游行，抗议摊粮派捐，向富豪劣绅

素食，迫使伪县府向贫民发放粮食。佑之还组织力量，响应川东第二路红军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工作，但被奸细告密，机关被破，陈书农悬赏缉捕共产党人，佑之幸免，调到重庆工作。

1929年至1930年间，佑之当选为省委委员，直接领导江巴中心县委工作。他在重庆工作时期，生活仍然十分艰苦，有一段时间，他住在两路口一间靠近街面的小楼上，为了把一切可以节省的钱节省下来，作为党的办公费和补助其他党人的生活费，自己作饭洗衣，作饭也没有买锅，就用自己洗脸洗衣的铜盆作饭。一次，同他在重庆工作的地下党人李坤杰和另外两个人去他住所，见煮了一盆稀饭，兼作办公的用桌上摆着两块豆腐干，据说还是他特意准备开会时大家吃的，平时他生活朴素，吃苦耐劳，也就可以想见了。他不是没有钱，家属常常支援他，只是他具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罢了。他的住房也十分简陋，墙壁是用竹子夹的，旧得快要朽了，容易为人忽视，可是它却大有用处。当时，为了响应红军入川，准备武装暴动，佑之用从家属中筹积来的款子，经手买了新式的快慢机手枪十支，就藏在这用旧报纸糊了的破壁中间。这批枪，是他用了大洋200元，从敌人二十一军军部的管库员那里秘密买来的。事后，管库员分赃不平，发生内讧，洩露了武器被共产党弄走，敌人就疯狂地四处搜捕共产党人。

在重庆桂花街有一所祠堂，门上书有“五世同堂”四字，佑之每天就在这祠堂后面的阁楼上，秘密联系党人。当时在龙王庙小学教书的袁某，长一脸的大麻子，人称袁麻子，佑之的信件由他收转，他知道佑之的行踪，叛变后领着敌人的便衣特务藏在楼阁，当佑之按时到那里接头时，就被他们逮捕了。

佑之是在1930年12月被捕的，敌伪军法官再三审讯，威吓利诱，妄想他供出组织和党人，佑之坚贞不移，视死如归。敌人阴谋破产，乃于12月31日将佑之枪杀于重庆南通门外罗家湾。佑之的胸背中弹倒下后，他还用最后的力气，从地上爬起来，奋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敌人慌忙地对准他的头颅开枪，佑之才与世长辞，为党和人民献身了。

佑之牺牲后，他远在宜宾的弟弟神情不安，夜睡不宁，梦见佑之归来，慷慨吟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并说：“诸葛未亡犹是汉，伯夷虽死不从周。”弟弟惊醒后，感到不祥，隔日就见到了31日重庆报载“共产党省委第二胡子马克思郑佑之执行枪决”，弟不顾一切危险，赶到重庆，经过十几天探寻，才由党人李坤杰找到一裁缝工人带领，在郊区荒山上的万冢丛中得到先烈的遗体，络腮胡须，面貌仍然。弟弟等把遗体抬到江

边，早就备好了衣棺殓。这时，佑之胸部中弹的伤口中，鲜血直冒出来，在场帮忙的亲友和工人见了，都非常感动，说是烈士精神不死，寄重望于亲人。专门买来运送遗体的船，从长江逆流而上，转至沱江，抵邓井关，再陆运抵自贡，时近年关，弟弟款又用完，十分焦急，好在佑之的六弟携款连夜赶到，弟兄商议，不敢运回家，就连夜接洽各方，次日在自贡郊区广华山东狱庙后山暂殓，直到抗日战争期间，才将烈士棺柩运回家乡，遵照佑之的遗言，安葬在普岗寺平民学校的后山上。

先烈们过去是在环境险恶，万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革命的。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打江山。今天，我们来纪念先烈，要在党的领导和教育培养下，继承和发扬先烈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抵制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作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1966年3月重新整理

注：郑瑞符是郑佑之烈士的哥哥。